

中国基督教

罗伟虹 / 著



辽河传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基督教 / 罗伟虹著.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4.1

(中国宗教基本情况丛书)

ISBN 7-5085-0399-6

I. 中... II. 罗... III. 基督教史—中国 IV. 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3102 号

《中国基督教》

责任编辑: 荆孝敏

编辑助理: 蔡 程

图片提供: 罗伟虹 新华社摄影部等

设计承制: 北京紫航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彩集嘉禾印刷有限公司

《中国基督教》

五洲传播出版社

地址: 中国北京北三环中路 31 号 邮编: 100088

电话: 82008174 网址: www.cicc.org.cn

开本: 140 × 210 1/32 印张: 3.85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印数 1-3000

ISBN 7-5085-0399-6/B · 26

定价: 21.00 元

引 言

基督教，即英语 Christianity，指从犹太教发展而来，耶稣基督所创立的，公元初在罗马帝国流传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包含有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支派。本书所指的是新教，即英语 Protestantism 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

基督教新教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产物，德国的马丁·路德向天主教罗马教廷的神权发起了猛烈抨击，并与教廷公开决裂，使基督新教冲破了天主教的桎梏而诞生。18世纪以来，随着各资本主义国家海外市场的建立和殖民统治的加强，基督教掀起了一场全球性的宣教运动，各宗派纷纷组织传教差会，派遣传教士向国外进行传教，基督教的海外传教势力也随之发展。

自1807年9月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开始了基督新教在中国的传教历史。传教初期，基督教借助武力和不平等条约，得到在中国传教的“特权”。政治上文化上的冲突使基督教不断遭到中国人民和官绅的反抗，教案迭起，传教事业进展缓慢。20世纪以后，传教士在教育、医学、出版等领域传播了西方文化，基督教影响逐渐扩大。但传教士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居高临下的态度及西方文化的优越感，仍不时与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形成冲

突，促使爱国的中国基督教徒重新思考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处境，发起了自立运动，探索教会本色化道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基督教经过三自爱国运动的改造，割断了同帝国主义的联系，实现自治、自养、自传，团结了广大信教群众，成为爱国的宗教组织。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中国有很大发展，至今全国有基督教信徒 1600 万，广大信教群众注重在各种场合“作盐作光，荣神益人”，为神作美好的见证。中国基督教在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培养青年教牧人员，积极推进神学思想建设，开展社会服务事工，加强与世界各基督教会的友好交往等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使基督教的形象有了很大改观。

基督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已近200年，期间经过了曲折的历程。本书所反映的只是一个概貌，以便使人们更好了解基督教在中国走过的道路，了解今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及影响。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早期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 一、早期来华传教士 / 1
- 二、基督教差会的进入 / 6
- 三、早期传教士的传教特点 / 10
- 四、中国人民的反抗——教案迭起 / 17

第二章 20 世纪初期的传教高潮与教会复兴

- 一、中国的门户开放和社会变化 / 24
- 二、基督教传教方式的转变 / 28
- 三、基督教会的发展 / 31

第三章 基督教自立运动和本色化运动

- 一、力图摆脱差会控制的自立运动 / 37
- 二、消除西方文化色彩的本色教会运动 / 48

第四章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 一、基督教面临新中国的抉择 / 59
- 二、三自宣言的产生 / 65
- 三、三自运动的新阶段 / 68
- 四、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 / 70
- 五、三大见证十项任务 / 74

第五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基督教

- 一、中国基督教的恢复和发展 / 76
- 二、建立健全教会组织,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 / 83

三、办好各类神学院校，培养青年教牧人员 / 91

四、积极推进神学思想建设 / 96

五、举办福利公益事业，开展社会服务事工 / 103

六、加强与世界各基督教会的友好交往 / 112

第一章 早期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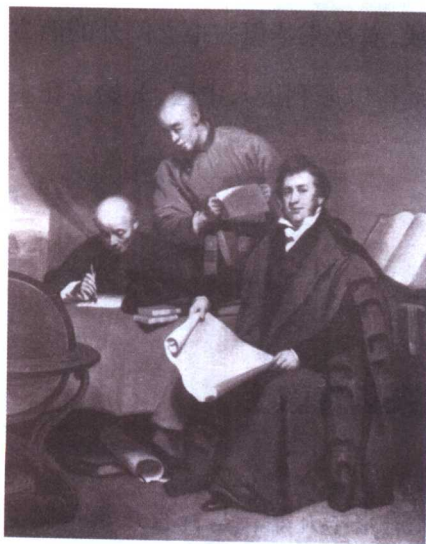
在中国历史上,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一个分水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被强行打开,中国社会从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首次来华但被拒之门外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也在鸦片战争以后得以顺利进入中国,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事业。

一、早期来华传教士

从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开始，基督教开始叩响了中国的大门。但在当时，中国的清朝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且对天主教“礼仪之争”后下达的禁教令还没有解除，禁止外国传教士

在中国传教，因此，传教士无法以合法的身份进入中国。这一时期，传教士只能在中国的香港、澳门、广州及南洋等地徘徊，为进入中国作积极的准备。

基督教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是英国伦敦传教会的马礼逊(R. Morrison, 1782—1834年)，他于1807年从美国搭乘“三叉戟号”商船，历经4个月的海上航程，于1807年9月4日到达澳门，三日后进入广州。马礼逊为了取得在澳门和广州的合法居留权，长期隐瞒其传教士身份，在英商垄断的东印度公司当译员。他一面学习中文，一面翻译《圣经》和编撰《汉英字典》。由于深入



◎ 马礼逊是基督教第一个来华的西方传教士，这是他和中国助手梁发等在翻译圣经

中国内陆传教十分困难，马礼逊于1813年向伦敦传教会建议，以印度以东地域为传教范围，组成恒河外传教会，还提出“恒河外传教会计划”，内容包括办学校、出刊物，联合其他差会传教士共同布道等。那时马礼逊一部分时间在广州，应付东印度公司方面的业务，一部分时间从事翻译圣经和传教工作。

他以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为根据地，开展传教活动，主要在澳门及南洋的华人中间传教，同时，他在广州家里进行布道。马礼逊于1814年秘密发展了中国第一个基督教徒蔡高，于1823年按立了第一个中国牧师梁发。作为“恒河外传教会计划”，在马礼逊的倡导和参与下，1818年在马六甲兴建了英华书院，既向来华的欧洲人教授中文，又向华人教授英语。同时，伦敦会传教士还在南洋地区创办了几份中文期刊。马礼逊在中国期间，还被任命为英国政府特使阿美士德的翻译，参加了与清政府的谈判，虽然历时一年的外交谈判未有结果，但马礼逊仍借助北上的机会，了解中国内地的情况。他的表现深得英国政府的赞赏，去世前被任命为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的秘书兼翻译。马礼逊的两个儿子马儒翰（J.R.Morrison）、马理生（M.C.Morrison），后来也定居中国。一个参与中英《南京条约》的谈判，后来任香港殖民政府的立法委员；另一个担任过英国驻广州的领事。

马礼逊为传教写了不少布道小册子，特别是1813年译出《圣经·新约》，1819年在米怜的协助下，译完了《圣经·旧约》，马礼逊将他译的圣经定名为《神天圣书》。

美国第一个来华的是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C. Bridgman，1801—1861），他于1830年到达广州后，住在美国商馆内，在马礼逊和梁发的帮助下开始学习中文。裨治文所从事的主要是翻

译、出版、教育等方面的工作。裨治文办了英文版的《中国丛报》，专门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政治、历史和人文情况，他还翻译了《美利坚合众国志略》等历史地理书籍，把西方的人文和科技知识介绍给中国。鸦片战争后，美国政府派特使顾盛来华，强迫中国政府与之签订《中美望厦条约》，裨治文担任了美国政府使团的秘书和翻译，参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鸦片战争结束后，裨治文迁居上海，担任上海文理学会第一任会长，该学会在上海设立了图书馆、博物馆，图书馆有大量藏书，闻名远东。1861年裨治文因患痢疾在上海去世。

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又译郭实腊，K.F.A.Gutzlaff or 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于1827年到达爪哇，向当地的华侨学习闽、粤方言，在医院中布道时还学了一些医药知识。1828年郭士立经新加坡去暹罗，继续在华侨中活动和学习中文。1829年他前往马六甲，接受伦敦会的津贴，协助伦敦会工作。1831年他到广州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译员。在传教活动方面，郭士立翻译了一些分卷《圣经》和布道小册子，还写了一些介绍东西方文化的书册，如《中国史略》、《开放的中国》、《英国史》等，尤其以创办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杂志为最有名。1844年他出资成立了一个名为汉会（又称福汉会）的组织，最多时达千余人。郭士立虽然也翻译了一些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写了介绍东西方文化

的书，但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更感兴趣，曾多次乘坐中国货船或东印度公司的侦察船到中国沿海城市，刺探情报，为殖民主义侵略效劳。1831年他第一次在中国沿海进行侦察，带了海图、测绘仪器和传福音的书刊等，一身中国水手打扮，登上贩运鸦片的“顺利号”货船。他一路沿海岸北上，历经厦门、台湾、宁波、上海，直至天津。1832年2月，他乘坐由东印度公司的胡夏米统领的“阿美士德号”侦察船，第二次沿原路线北上，这次不仅到了朝鲜和日本，还深入长江以内的吴淞、宝山等地。回来后他写道：“这一切我已调查清楚，希望商人和传教士重视这些有利可图的地方。”第三次北上是在1832年10月，他乘坐大鸦片商查顿直接提供的走私快船“赛尔富号”，径直到达东北的奉天，直到第二年4月底才返澳门。后来郭士立出版了一本《1831—1833年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实际上他的沿海侦察活动有十次之多。1840年郭士立还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担任英军司令官的翻译和向导，直接为英国侵略军效力。

这一时期来华的传教士还有：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米怜（W. Milne）、麦都思（W. H. Medhurst）、雒魏林（W. Lockhart）、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S. W. Williams）、伯驾（Peter Parker）、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W. J. Boone）等。

二、基督教差会的进入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美等国的传教差会所派传教士开始增多,差会开始进入中国活动。这一时期来华的差会主要有:

英国伦敦传教会 伦敦传教会是最早派传教士来中国的,继马礼逊之后,伦敦会于1843年又派麦都斯、雒魏林等来中国,他们于次年在上海租用民房,边施诊边传教。鉴于上海地位的重要,差会又拨款要他们在上海置地造房,形成了以教堂、诊所、印刷所和传教士住宅为中心的“麦家圈”。以后数十年间,伦敦会又陆续派了慕维廉(W.Muirhead)、伟烈亚力(A.Wylie)、韦廉臣(A.Williamson)等传教士来华,除了在上海外,还到北京、烟台、汉口、厦门等地传教。

英国圣公会(行教会) 1844年派传教士四美(G.Smith)和麦克开拉啓(T.McClatchie)来华考察,确定宁波为该差会在中国的传教中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派了数名传教士来华,从宁波向绍兴、杭州等地发展,布道地区约占半个浙江。差会还在上海建造了圣三一堂,在宁波创办圣三一书院,还开办了英华学堂和戒毒所。

英国浸礼会 1859年派2位传教士到山东，以烟台为该会的传教基地，但成效甚微。1869年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T. Richard）到烟台，与韦廉臣合作，打开了传教局面。

美国公理会 1843年首派传教士波代安（D. Ball）到香港行医传教，两年后进入广州，孙中山先生信仰基督教加入的就是该会。1847年后该会又派多名传教士在福建传教，并于1853年在福州



◎ 1986年6月25日，北京基督教会崇文门堂圣诗班在和平祈祷时献诗

创办了男女学塾，为福州协和大学的前身。公理会传教士进入华北是由白汉理（H. Blodget）于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跟随英军北上抵达天津，4年后他到达北京，创办了著名的灯市口教会。1865年后明恩溥（A. H. Smith）、谢卫楼（D. Z. Sheffield）等传教士先后来到华北。明恩溥后来著有《中国的农村生活》、《战乱中的中国》等著作，成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谢卫楼则为华

北协和大学的首任校长。

美国圣公会 1844年派文惠廉主教到上海，在苏州河以北地区买地盖教堂并创办书院，以后向长江三角洲发展。第三任主教施约瑟（S.I.J.Shereschewsky）1877年接任后，致力于办学和译书，创办了圣约翰书院，后发展为圣约翰大学。

美国南北浸会 1845年南浸会始派传教士在华南地区传教，1847年开始以上海为基地向华东地区发展。在上海的传教士晏玛太（T.Yates）于20世纪50年代小刀会起义期间经常与之接触，将窥得的情报送交美国领事馆，并在《北华捷报》上发表，后汇集《太平军纪事》出版。北方浸礼会主要在宁波、杭州、上海等长江以南地区发展。

美国长老会 1844年开始在广东、厦门、宁波传教，并逐渐向上海、山东等地发展。到1877年，中国境内的长老会信徒共有1100余人。该会办有刊物《通问报》。20世纪初的著名传教士有司徒雷登（J.L.Stuart）、毕范宇（F.W.Price）等。

美国卫斯理宗 在中国北方被译为美以美会，南方被译为监理会。1847年开始在福州传教。传教士保灵（S.L.Baldwin）在福州创办了第一份供在华传教士交流的《教务杂志》。著名传教士林乐知（Y.J.Allen）于1860年来华后曾任中国监理会传道团团长。

中华内地会 由英国传教士戴德生 (J.H.Taylor) 于 1865 年创立, 是跨国跨宗派的差会。要求传教士的衣着起居尽量中国化, 以无偿献身的精神来传教。其总部设在上海, 但发展方针是避开大宗派差会在沿海和城市的传教地区, 专向中国的内地发展, 在四川、河南、陕西、云南等省都有发展。到 20 世纪初, 内地会在中国约有 700 座教堂, 19000 余名信徒, 还办有若干小学、医院等。

三、早期传教士的传教特点

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初，既受到来自清朝政府的种种限制，又不被中国的民众所了解，因而困难重重，成效甚微。为了打开局面，传教士不惜采用了不少非宗教手段，来帮助传教工作的开展，这一时期基督教传教士工作的主要特点是：

(1). 在打开中国大门这一共同目标下，传教士、商人、外交官携手从事侵略活动。

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传教士一面为基督教会服务，一面为殖民主义侵略效力，身兼数职，在不同场合扮演不同角色。如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不仅多次混杂在中国水手中北上刺探情报，鸦片战争一打响，他就全身投入这场罪恶战争。他起先担任英侵略军司令官郭富的翻译和向导。1842年春，当英军攻占宁波和舟山以后，他接受任命为当地的行政长官。当英军入侵上海不久，他也随之而至，代表英军颁发安民告示，向上海知县勒索总数达30万银两的赎城费。同年6月，侵略军进攻镇江，因当地军民奋力抵抗，久攻不取，郭士立就亲自参加围城。中英议和时期，郭士立和马儒翰一同参与起草并签订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第二